

我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倒盏民俗文化村开幕

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青翠的毛豆……秋天的倒盏民俗文化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9月22日，由区农办主办的2018·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倒盏民俗文化村举行。区管委会副主任寇献众出席，倒盏民俗文化村董事长刘磊佳、区妇女代表刘沟村支部书记刘亚阁、大学生创业代表倪冬、农民返乡创业代表李跃飞、洛阳市优秀农民工代表魏荣坡等参加活动。

据农办负责人介绍，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全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成就、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变化、伊滨农民的新风貌。通过丰收节活动的开展，充分展现伊滨农村地域特色、农业生产水平、农民生活品质，让全社会更加了解农业、关注农村、尊重农民。同时大力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文/图 陈晓辉）



各种农产品现场供人品尝



说伊滨



游客现场领取丰收礼品



活动现场文艺表演



各类农产品琳琅满目

人文历史

闲情偶寄

同行未必是冤家

□ 杨群灿

俗语“同行是冤家”，是说同一领域的竞争对手，常常会怒目而视、相互排挤，有的还非要争个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难道都是这样的吗？

民国时期，李村镇北后街仁里巷有两家对门行医的，居东的宋绍濂擅长中医内科，临街墙上挂有两块匾额，系书法名家福堂高佑的墨宝，一曰“春满杏林”，二曰“业精岐黄”；居西的石廷翰中医外科最拿手，临街墙上也悬两块匾额，为本地书家杨国栋所书，一曰“据德依仁”，二曰“徙柳出蛇”。因他们医术高超，虽处僻巷，前来求医者亦不绝如缕。

二人皆以西大街“九品儒医”李庚辰为榜样，一般在家坐诊，病家不能来者可上门应诊，没钱的也可看病给药。若有多个患者求诊，必定先给穷者看，待包好药、交代完注意事项，站一旁等着，接着给富者看，最后在医者客气的示意下，富者连同穷者的费用一同打发，穷者拱手道谢——这几乎成了医患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

有一年冬天的早上，一人乘轿车请宋大夫上门给妻子看病，宋大夫刚走出门，有个三旬左右年纪的小伙子也来请大夫给母

亲看病。小伙子见人家有轿车接送，怕大夫不肯去自己家，就拉着大夫的手恳求说，俺娘七十多了，受不了这天冷，我没车没马，就背着您去吧！看着小伙子着急的样子，宋大夫微微一笑，说你放心，不知咋的我今天正好不想坐车，就让你背吧；你有这份孝心，不管药费多少，也都免了！对面石大夫家的学徒正在门前扫地，看到这一幕，赶快回家说了，石大夫急忙牵着马走出来，坚持把宋大夫往上马石上让，说这马闲着也是闲着，老宋你就骑马去吧！看到此情此景，乘轿车的十分感动，便把宋大夫劝上轿车，命车把式赶车先替孝子请大夫。

还有一回，有个男子胸肋长一恶瘤，将溃未溃，疼痛难忍，被人送到石大夫家。石大夫诊视后认为应马上割除，但困于长瘤部位特殊，加上熬制止痛汤剂所需时间迟缓，效力如何也拿不准，踌躇半晌未能上手。对门宋大夫听说后，即刻赶过来，拿出一块砭石，一包银针，笑道：“咱哥俩各使所长，必定手到病除！”最终，医患双方皆大欢喜。

两位大夫宅心仁厚，医术精湛，成为洛邑东南路第八区医界的典范，至今一些老人提起来，仍是赞不绝口。

一条河路过伊滨

□ 陈晓辉

伊河从时光尽头蜿蜒而来，流淌过了龙门，遇到一个小公园，四季的风从这里路过，早晚的云霞在这里渲染——就有了伊滨公园。

在伊滨公园，只要有一棵芦苇把芦花染成银白，就能引来一个斑斓的秋天。

草们疯长了一个夏天，累了，悄悄把自己的茎变成绛红；春天刚栽下的一排银杏，迫不及待地披上一身璀璨的金黄，很负责地制造秋天应有的斑斓；曾经娇艳盛装的海棠，收拾起曾经的绮梦，沉默地换上一树深绿……

唯有那些气派笔直的白杨树，好像对秋天的到来无动于衷，随风飘下几片叶子，仍旧镇定自若地指向蓝天。

常来伊滨公园的人，除了我这样闲逛的，还有一群钓鱼者。一张小凳，一根钓竿，他们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耐心地守着悠悠河水。偶尔站起来，一定是有鱼上钩了，钓者收起长长的钓竿，摘下那条倒霉的鱼，再次坐下，那坚持的姿势，仿佛能到老到天荒。

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条鱼？名利欲望，都是鱼饵，钓的是人心。

在伊滨公园，只要一只鹭鸟接住一片晚霞，就能洒下一片秋天。

喜鹊们披着自己黑白色的礼服，在草地上一本正经开起会议，研究秋天的基础建设；野鸭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秋天明净寒凉的水中游来游去，悠悠然不知世事千年；还有草窝中的野鸡，傍晚行走时，忽然“呼啦

啦”飞起，吓人一跳……

啄木鸟，戴胜，我不知道它们在秋天都做什么，是存储粮食过冬，还是等待飞到南方呢？

最让我心动的，是一只秋天的小翠鸟。

那天在夕阳下，忽然一支芦苇微微一动，落下一只浑身翠绿的小鸟，啊，这不是小时候课文里描写过的翠鸟吗？“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那一身翠绿光洁的羽毛震慑住了我，我屏住呼吸，只求它能多留片刻。

也许过了几个小时那么长，也许不过一两分钟，翠鸟不知发现了什么，“嗖”地一下，箭一样掠过水面，掠过几棵柳树几片芦苇，转眼就再也看不到。留下我，怅然若失许久。

一只小鸟，一段小时候背过却以为早就忘却的课文，小时候在课堂里认真背诵的日子，被一只绿色的小鸟翅膀衔来，留在伊滨公园的芦苇上。

前几天傍晚，云霞满天。又去伊滨公园，小径上忽然跑来一只欢快地摇着尾巴的小狗。后边小径那头走过来两位老人，头发花白，但穿着考究，很有气质的样子。老人呵斥小狗不要乱跑，又对我抱歉地笑一笑，挽着手慢慢走远。

在伊滨公园，只要一对手挽手散步的老人，就能温暖一条河流的秋天。

十月，我们为祖国庆生

□ 钱俊男

我们以十月中最隆重的礼节
欢庆她的生日
我们以金秋里最嘹亮的歌声
讴歌她的荣光
她是世界东方古老的国度
美丽而宽广
她是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的部落
勤劳而坚强
黄河流成了她不息的血脉
长城挺直了她不屈的脊梁
她以健壮的手臂
邀来了五湖四海的瞩目
她以超人的胆识
浇灭了与时俱进的芬芳
她以最雄浑的笔墨
书写着泱泱大国的崛起
她以最博大的胸襟
弹奏着唐风宋韵的传扬
风雨中她一路高歌
艰险中她步履铿锵
她率领整个部落
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辉煌走向辉煌
她以“日不落”的姿势
定格成炎黄子孙眼中
彪炳千古的雕像

连载

《杨绛传》⑥

10. 十年尘世，也抹不去的韧劲

1、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绛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小说，但遭遇令人心寒。

杨绛曾对人说：“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但并未引起注意。钟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被当作白旗。”

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其标志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杨绛夫妇俩的日子过得非常小心谨慎，他们看到了亲友以及文学所的同事相继落难，内心悲痛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接下来的一九五八年，又是一个热昏的年头，在“大跃进”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钱氏夫妇双双受到严厉批判，成为众矢之的。

按照当时的逻辑，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乃“封、资、修”文学，充满毒素，杨绛夫妇对此不加批判，却大为赞赏，被认为是公开开放毒，蛊毒群众。于是，杨绛夫妇成为非拔掉不可的“资产阶级的白旗”。

于是，杨绛和钱钟书双双被抓去批斗。但杨绛、钱钟书在文学所的批判会上，缄口不言，用沉默以示抗议。

由于杨绛和钱钟书人缘较好，所以受到批判的程度，在整个所里还不算最重的。

2、下乡运动，改造自我

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的十月下旬，文学所决定分批派员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地点在北京郊区。

杨绛被分在第一批下乡。一家三口，女儿钱瑗已下厂炼钢，丈夫钱钟书下乡比她迟一个月。杨绛那一批约二十人。一到山村，就遇见了

所谓的“蒙娜丽莎”和“堂吉珂德”。

原来，同去的一位老先生遥指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只长竹竿，翘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个老先生说：“瞧！堂吉珂德先生！”

“哈！可不是嘛！”

虽然“蒙娜丽莎”和“堂吉珂德”的由来让人有点啼笑皆非，却为杨绛一行人的乡下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在乡村，杨绛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农民阶级”，他们各不相同。

诸如一位大妈看见他们便打着官腔：“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

杨绛听到了笑而不语，心想：确实，没有这个活动，我或许永远都不会到这地方来。

各种各样的农村人民形象为杨绛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生动而又鲜活的素材。

杨绛下乡原定三个月，后缩短为两个月。她们在回京之前，还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在杨绛得到的评语当中，有一句说她能和老乡亲们“打成一片”，这令她得意了一会儿。

就这样，杨绛“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

3、不改自我，畅玩文学

返京以后，杨绛回到文学所上班。经历了下乡锻炼，又重为人师表，她依旧循循善诱地指导青年研究人员的翻译工作。

当时，杨绛和钱钟书作为“白旗”受到批判之后，他们更加贴己，互相照应，虽说喋若寒蝉，但依然享受着生活的情趣，依然享受着文学的乐趣。

一九五九年，杨绛忍不住技痒，又开始写研究文章。她的《论萨克雷〈名利场〉》就是这时写的。该文是杨绛为她的小妹杨必翻译的英国古

典名著《名利场》而写的。

孰料，文章发表后，又引来一阵批判，被扣上鼓吹写“真实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

不过，此时的杨绛已能坦然面对这些“罪名”，不予理会，依旧享受着独属于她的文学乐趣。

《论萨克雷〈名利场〉》发表后，根据文学所领导的要求杨绛开始了对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为了译好《堂吉珂德》，杨绛从一九五九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学了两年，一九六一年开始动手翻译，至一九六六年，她已经完成了工作的四分之三。但由于“文革”的干扰不断，整部作品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完成。

4. 文革风暴

一九六三年，杨绛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妹妹杨必，顺便拜访了挚友傅雷夫妇。

“别时容易见时难”。孰料，这竟成为杨绛与傅雷夫妇相见的最后一面。

一九六六年九月，“文革”风暴骤起，杨绛、钱钟书多年的好友傅雷以及其妻子朱梅馥双双饮恨而去，令人扼腕。

杨绛和钱钟书等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当时，在外文所，虽然没有一张揭发杨绛的大字报，不过她觉得事情已经不妙。

有一次大会前群众传一份文件，传到杨绛近旁时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

再有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发问：“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会后有人通知她：“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杨绛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样层出不穷。

有一天，钱钟书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的“怪头”。幸好，杨绛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

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

不久，杨绛也“恭逢其盛”，受到同样的遭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这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译的《堂吉珂德》被没收，晚上又给剃成“阴阳头”。这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可谓奇耻大辱。

钱钟书看到后，急得直问：“怎么办？”

杨绛安慰他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会有办法的。”

杨绛虽这样安慰钱钟书，但内心也是有点忧虑与不安的。

“顶着个‘阴阳头’出门，还被当成什么看待呢？”杨绛心中不免哀叹，内心也开始变得焦灼。

杨绛再看着一脸担忧地看着她的钱钟书，内心突然就释然了，想道：自己虽然被人当作“牛鬼蛇神”看待，被人当作“反动分子”，但至少还有个懂她的人，自己又何必在乎那么多呢？又何必在乎不了解她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呢？

杨绛内心的阴霾顷刻间就消散了。

不过，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杨绛还是想着将她的“阴阳头”“改造”一下。

后来，杨绛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办法来。她将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做成了一顶假发。

杨绛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不过后来她发现假发也没有什么用处。

第二天，杨绛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她有月票，不用买票。不料，站在远处的售票员一眼就识破了她的假发，对她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

杨绛连忙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但面对着全车人探寻的眼神，竟也说不出什么辩驳的话来。等车一停，杨绛就赶忙下了车。

从此一年之内，杨绛不敢乘车，全靠两条腿走路。

杨绛在当时所受的屈辱，不是一般女人可以忍受的，但她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相信总有一天可以获得平反。

5、为你，我不愿就

剃“阴阳头”只是“文革”风暴中一个小小的缩影。被批斗、揪斗更是家常便饭。

其中有一件事非同小可。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钱钟书轻蔑领导的著作。

杨绛看到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无缘无故地栽赃人！”

杨绛气冲冲地回家后，立即把这件事告知钱钟书。

于是，两人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求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糯米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学部下方。

第二天，杨绛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

就在专门的批斗会上，杨绛受到“革命群众”的审问。群众问：“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杨绛说：“是我。”

群众又问：“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杨绛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杨绛干脆就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那天正是出于对丈夫钱钟书的挚爱，杨绛一口担保绝无此事。

当时，群情激奋，杨绛也十分气愤。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下令让它打锣自报罪名。杨绛正值火气冲天，没处发泄，立即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借以发泄无比的愤恨。

这下可翻了天——台下闹成一团，造反派要驱杨绛到学部大院去游街。

结语：自解放以来，杨绛夫妇经历了种种磨难，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下乡运动等针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运动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

然而，在一九六六，最残酷的、最摧残人心的针对先进知识分子的运动——“文革”风暴来了，杨绛夫妇均被视作“牛鬼蛇神”，是批斗的重点对象。

在接下来的漫漫十年风暴中，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是否还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呢？